



清华大学

国情研究中心

Center for China Study, Tsinghua University

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

——以 **重庆** 为例

◎ 胡鞍钢 主编

党建读物出版社



清华大学
国情研究中心

Center for China Study, Tsinghua University

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

——以 **重庆** 为例

◎ 胡鞍钢 主编

党建读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以重庆为例 / 胡鞍钢主编.

-- 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099-0148-9

I. ①科… II. ①胡… III. ①地区经济—经济预测—
重庆市 IV. ①F127.7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53215 号

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

KEXUEFAZHANGUAN DE FANGFALUN

——以重庆为例

胡鞍钢 主编

责任编辑:张晓辉 封面设计:盛世华光

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宣武区南横东街6号 邮编:100052 电话:010-58587676 / 7790)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15.25印张 223千字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978-7-5099-0148-9 定价: 42.00元(平)
55.00元(精)

本社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电话:010-58587660)

(序言)

真知源于实践 创新来自地方^①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②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历史轨迹并不是一条笔直的大道,也不是预先就设计好的,而是不断探索、不断总结、不断开拓、不断变化的道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看,至少经历了三代发展观: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江泽民时代;胡锦涛及以后时代。从三代发展观的战略和发展看,每一代发展战略都是承上启下,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反映了不同时期中国的国情特点,也反映了不同时期领导人对现代化与全球化挑战的不同响应。每一代发展战略既有历史的进步性与合理性,也有历史的阶段性与局限性。^③ 在本书中,我们对这一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把它表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软件版本”的升级换代。由于在开发和设计这一“软件版本”时,总会因为信息和知识的不确定性、不完全性以及与实际情况的某种不适应性、不协调性,因此在实践中不断地改进、不断地增补、又不

① 本文系作者对《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以重庆为例》一书的序言,写于2010年7月27日;童旭光博士协助编辑此书。

②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

③ 胡鞍钢:《中国:新发展观》,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

——以 **重庆** 为例

断地创新,就形成了既相互联系、又不断升级的“软件版本”。换言之,前一个版本是后一个版本的基础,后一个版本是对前一个版本的补丁、修正和升级,由此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软件版本”的1.0版,到2.0版,再到3.0版。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在于开创了1.0版,邓小平同志的伟大功绩在于升级了2.0版,江泽民同志丰富了2.0版,胡锦涛同志升级了3.0版,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集六十年中国之路之大成。可以预期,今后的领导人都将在这三个版本的基础上不断地升级换代,从而走出一条真正属于中国的“中国之路”。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及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共产党党情和中国国情相结合达到了新的高度。“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已经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科学发展观”这一理论成果已经成为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和重大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已经解决了未来中国发展方向的“过河”目标的问题,但是对于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各地差异甚大的中国来说,各地区还要解决落实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桥”和“船”的方法论问题。^①客观地讲,提出和学习科学发展观的理念相对容易,而落实科学发展观并在全中国不同地区进行实践则要困难得多。

那么,什么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呢?

一是“真知来源于实践”。它是指认识 and 理论是“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诚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

^① 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①“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②实践既是检验真理和正确的标准,也是检验谬论和错误的标准。

二是“政策来自于群众”。它是指政策的制定是“从群众中来”,政策的实施是“到群众中去”。这正是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基本的领导方法。^③党的政策就是党领导人民行动的指导。什么是好的政策呢?或者说什么是正确的政策呢?简言之,就是“顺应民心,符合民意”。因此在制定政策时,就需要充分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即“问计于民”;在实施政策时,就需要充分适应人民群众的需求,即“问需于民”。党的政策,就是要把人民的意愿、要求、利益变为可实施的行动手段,这个政策就是要让人民满意,符合人民最根本、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对以上两个方面,早已形成共识。它是毛泽东同志的方法论创新,即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和群众路线,它还是我们党长期的政治文化传统和政治组织优势。

三是“创新来自于地方”。它是指创新的发明是“从地方中来”,创新的实践是“到地方中去”。这是邓小平同志所提倡的中国改革创新的方法论。1978年安徽、四川等省大胆进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农业改革,争议十分激烈,但是这一地方创新及时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明确支持,他主张并积极鼓

①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页。

② 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1963年5月),《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0页。

③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6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

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

——以 **重庆** 为例

励地方创新,用新概念、新思路解决农业问题。^① 因而也就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创新方法论。

为什么说创新来自地方呢?这是与中国的基本国情密切相关的。从人口规模来看,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从国土面积来看,中国是世界第四大国;从政府管理层次来看,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五级政府国家;从各类发展指标来看,中国是世界上地区发展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这些基本因素都告诉我们,治理中国难度极大,面临着极大的信息与知识的不确定性、不对称性和不完全性,也面临着各种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风险,不可能用一种创新、一种模式、一种政策、一个标准来治理中国。这就需要鼓励地方创新,使众多的地方创新外溢、分享并聚合成全国的创新,从而构成中国独有的改革创新。鼓励地方创新是最智慧的改革方法论,改革成本最小,改革收益最大。一地的创新失败不影响全局,而全局的失败必然损害地方利益。地方创新使总体创新失败风险分散。

什么是地方创新呢?从一定意义上看,相对历史而言,创新不同于以往,会带来新的社会价值或收益;相对不同地区而言,一个地区的创新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创新。因此创新的精神和过程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但是创新的结果和模式并不具有普适价值,这就意味着不同的地区都有创新的可能,一地的创新并不能替代他地的创新,一地的创新并不等同他地的创新,一地的创新并不妨碍他地的创新。因此我们不可能像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样,以大寨、大庆为典型,让全国所有的工农业强制性地学习模仿照搬一两个典型模式,而是鼓励各地学习他地经验,最重要的是鼓励他们创新本地经验。可以预见到,全国各地不同的创新将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为什么说地方创新如此重要?因为人民才是创新的真正动力。^② 地方总是处在社会矛盾的焦点,比上级更熟悉情况,比上级更接近人民,更直接

① 王瑞璞主编:《中南海三代领导集体与共和国经济实录》,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710页。

② 毛泽东同志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感受人民的迫切需求,从而也会对民意压力及时做出回应,使其压力转化为改革创新的动力。地方的创新反映和顺应了人民的创新,因此,地方创新的本质是人民为主体的创新。

为什么中央要鼓励地方创新呢?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地方创新是全国创新的“源头活水”,而中央创新则是全国创新的“百川归海”。中央要尊重地方创新,支持地方创新,还要鼓励地方大胆创新,允许地方创新失败,指导地方创新纠错,使创新者并不因为失败而受到惩罚,更应当受到激励,这样就形成全国各地新的“创新竞赛”。这一竞赛旨在鼓励地方“良性创新”,即一地的创新对他地产生正外部性和外溢性,而不是“恶性创新”,即一地创新对他地产生负外部性和外溢性。

以上三个观点构成了中国创新方法论,不仅包括了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党的群众路线,而且也总结了邓小平同志鼓励地方创新的方法论。它们之间不仅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彼此之间也形成了内在逻辑:有什么样的社会实践,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理论;有什么样的社会理论,就会指导什么样的社会实践;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它们都是不断创新的实践或理论,否则,实践就不会进步,理论就不会发展。无论社会实践还是社会理论的创新都是一项风险活动,并不能自动成功,在许多情况下常常会出现失败,这如同自然科学的反复实验一样,但总会在多次失败之后有新的发现,有新的成功。聪明的人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少犯错误,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特别是不重犯以往的错误,以较少的失败取得较大的成功。这就取决于能否建立一个有效的信息正反馈机制,既可以对理论不断地修正、丰富、完善,也可以正确地指导实践。在这一过程中,创新成为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实践和理论成果。每一次对实践和理论的创新,又成为了新一轮的实践与理论创新的起点。这就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

以科学发展观为理论指导,在中国 960 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土地上进行前无古人的经济社会转型与改革开放试验,是一项恢弘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对此进行细致的记录、深入的思考和认真的总结,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说,无疑具有极高的理论创新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本书是以重庆为案例,详细调查、专业化研究重庆是如何实践科学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

——以 **重庆** 为例

观,创新本地经验的。重庆是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我们对重庆未来时期的战略定位是:经济定位为西部的重要增长极和服务之都;城市定位为西部最大、最强的绿色城市群和基础设施网络;生态定位为长江中上游最大的生态安全保障区;开放定位为西部对内对外开放的重要高地;社会定位为全国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示范区。重庆“十二五”规划三个“率先”的重要目标是:率先在西部地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率先在西部地区转变发展方式;率先在西部地区实现城乡统筹。这就是“过河”的目的。然后就要解决“过河”所需要的“桥”和“船”的问题。那么重庆是如何创新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呢?我们仍可以从前述的三个方面来总结,显示了“重庆经验”的创新性和地方特色。

认识来源于本地实践。“重庆经验”的可贵之处在于,通过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愿景与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联系起来。通过“三项制度、三项活动”^①等方式实践新形势下党的群众路线,通过“唱读讲传”等方式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构与强化,通过“国民共进”、农村增收等探索社会主义社会更优的社会财富增长与分配机制。重庆对于科学发展观方法论的不断认识,来源于其不断的本地实践,“重庆经验”为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做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注释,也拓展了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广泛认同,成为各地区各部门学习、借鉴、分享的“公共知识”或“公共经验”。

政策来源于群众。“重庆经验”的独到之处在于,对于政策制定、政策实施的各个环节,始终坚持了“问计于民”、“问需于民”的基本原则,充分体现了“顺应民心、符合民意”的总体要求,如“三项制度、三项活动”等。特别是在处理各类突出社会矛盾和历史积案的时候,各级干部不再身居高墙之内,稳坐斗室之中,而是主动走出政府大门,走入人民群众中进行大下访,换位思维,千方百计解决碰到的一切问题。这些化解矛盾、处理积案的政策相

① 三项制度指基层党组织书记每周一次接待群众制度,基层党组织班子成员每年两次进家入户走访群众制度,群众意见定期办理反馈制度。

三项活动包括:三进三同(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干部大下访(大走访)、结穷亲。

当务实而灵活,一切都拿到群众中检验,拿到实践中检验,最终评价出什么是正确的政策,什么是错误的政策。而群众是最为智慧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总是对正确与错误的政策具有最终的评价权和决定权。

创新来自于地方实践。“重庆经验”的创新之处在于,根据自身的基本发展条件、发展限制因素和发展比较优势,结合党中央提出的“五大统筹”基本思路,创新性地提出“五大重庆”战略部署。由于全国各地情况不同,条件不一,“五大重庆”充分体现了本地科学发展的实践,具有鲜明的独特性、本地性和人民性。因此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成为广大人民的实践。面对多重的重大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无论是近期还是远期,无论是当前突出问题还是深层次矛盾,以科学发展观为灵魂的“五大重庆”逐步取代了“GDP至上”的思路,同时进一步制定全面而详细的实施规划,并且形成可量化的指标,可操作的办法,可评估的实施方案。我们把“五大重庆”称之为地方实践、创新科学发展观的成功案例。

3000万重庆人民直接参与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它涉及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公共安全、交通运输、生态环境等领域,处理和协调各类社会矛盾、冲突和利益关系,这不仅需要有“五个统筹”的大手笔和“五大重庆”蓝图的设计师,更需要有众多务实的“社会工程师”,他们既有地方长期工作的经验,又了解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国发展知识。他们的方法就是“边学习、边设计”,“边设计、边施工”,“边施工、边改进”,持之以恒地推进这项复杂的社会工程。

总之,“重庆案例”或“重庆经验”,给我们提供了贯彻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就是充分体现了“真知来源于实践”,“政策来自于群众”,“创新来自于地方”。这正是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历史财富,也正是我们继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的方法论。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①没有调查研究则难以结合具体的国情、省情、市情开展针对性的实践活动,没有调查研究更难以正确地认识和理解

^①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109页。

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

——以 **重庆** 为例

地方创新。国情研究中心历来重视调查研究。三年来我和中心师生到全国各地调研 37 次,走访县市 56 个,召开专题调研会 43 次。结合国家重大问题开展专题调研,如汶川大地震及灾后重建期间我亲赴四川调研 6 次,形成若干篇国情报告,参加了国家灾后重建规划设计及中期评估。又如各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调研,林业发展和林权改革调研等,通过发表国情报告,为中央和国务院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重庆也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地区,仅在过去两年(指 2008、2009 年)我就亲自赴渝调研 6 次,国情中心的崔之元教授和一批博士后、博士生和硕士生都先后参加调研,有的还在渝挂职工作,此外还有《21 世纪经济报道》首席记者赵忆宁参加了调研和采访。特别要表示感谢的是,王绍光教授和李希光教授对本书的重要贡献。王绍光教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系主任,同时担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是从事当代中国政治经济问题研究的优秀专家,近年来密切关注重庆的创新实践。他在文章中创新性地提出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三个版本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进一步深刻分析和认识重庆实践,也对全国各地产生了普遍的指导意义。李希光教授现任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他在文章中从理论上探讨了重庆故事与中国模式的内在关系,分析和比较了世界各国主要的发展模式,并大力倡导在国际思想观念市场中推销“重庆梦”。

本书可以说是近年来国情研究中心关于重庆研究成果的集成之作,从不同的研究角度——既有宏观的区域发展规划,又有微观的专项社会建设,既有理论探讨,又有实践总结,力图从多维度、立体地再现与总结重庆对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解、行动与感悟。愿本书能给各地带来有益的启示,产生思想的共鸣,更好地分享和掌握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推动各地的创新,进而集合成中国的创新。

胡鞍钢

2010 年 7 月 27 日于清华大学

目 录

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构建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	胡鞍钢 / 1
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 3.0:重庆经验	王绍光 / 25
绿色发展实践——以“森林重庆”为例	胡鞍钢 / 60
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以“平安重庆”为例	胡鞍钢 / 73
一个地区如何发展定位:以重庆为例	胡鞍钢 童旭光 / 79
重庆如何成为西部消费之都	陈泰锋 / 98
重庆建设低碳城市发展战略研究	常黎 / 104
重庆改革:国资增值与地票交易	崔之元 / 121
* * * * *	
“十二五”时期重庆基本市情分析	
胡鞍钢 陈升 童旭光 马伟	/ 133
重庆“十二五”规划主要目标与建议	
胡鞍钢 陈升 童旭光 马伟	/ 168
* * * * *	
重庆故事与中国模式	李希光 / 187
重庆如何进行地方创新——专访黄奇帆	
市长	赵忆宁 / 204
重庆如何化解历史积案——专访张轩副	
书记	赵忆宁 / 214
重庆的示范:走出混沌的信访地带	赵忆宁 / 221

重塑中国经济地理： 构建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①

胡鞍钢^②

引 言

随着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国家之间的竞争已演变为区域之间的竞争，加快区域经济发展成为各国政府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依靠独特的地缘优势和政策优势，形成了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区。这三大经济区已成为我国三大经济增长极和世界级城市群，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日益显著。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形成若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要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③ 2008 年以来，国家陆续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

① 本文系作者 2009 年 2 月 19 日晚在中共重庆市委中心组讲座的讲稿，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市长王鸿举等同志参加；后作者又作了修改。由常黎提供，陈升参与修改，王磊、唐玲参与讨论；作者 3 月 18 日又作了修改。本文于 2009 年 2 月 27 日发表于《国情报告》2009 年第 4 期。

②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③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 年 10 月 15 日），《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 页。

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

——以 **重庆** 为例

见》(提出了“三大定位”)①、《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提出了“四大定位”)②等纲领性文件,极大地推动了东部沿海经济区的发展。同时,在中西部地区也形成了成渝、关中、大郑州、大武汉、长株潭、沈阳等经济圈,加快了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增长速度,逐渐与东部沿海的三大增长极共同构成“三大六小”多极增长的新的经济地理格局。

2009 年是中央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设想的第十年,进一步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需要有新的思路和重大举措。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凭借特有的区位优势、率先制度创新及国家各类优惠政策的大力支持,逐步形成了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也步入了自我维持、自我投资的经济起飞阶段。但是,这也导致了生产力、生产要素、基础设施、科技实力、人力资本空间分布的非均衡性,并逐渐拉大了沿海和内陆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引发了诸多问题。可以预计,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在获得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之后,其发展速度将进一步加快。倘若内陆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没有新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增长极和城市群崛起,那么中国的地区发展差距由最近几年出现缩小的趋势很可能

① 2008 年 9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认为,长三角是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其地理范畴包括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两省一市”。按照总体要求,长三角将实现四个“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一体化发展,把长江三角洲地区建设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到 2012 年,产业结构中服务业比重明显提高,并基本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到 2020 年,形成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再用更长一段时间,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② 2009 年 1 月,《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正式公布,标志着珠三角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纲要》明确珠三角地区的战略定位是要做探索科学发展模式的试验区、深化改革的先行区、扩大开放的重要国际门户、世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成为带动全国发展更为强大的引擎。根据纲要确定的目标,到 2020 年,珠三角地区要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形成粤港澳三地分工合作、优势互补、全球最具核心竞争力的大都市圈之一,届时人均 GDP 达到 135000 元,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将达到 60%。

逆转反而会进一步扩大,经济地理格局将进一步失衡。为了如期实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体目标,就需要对已经实施十年的西部大开发战略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由国家支持和指导帮助地方构建若干个新的增长极,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从而形成内部大市场,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地理空间。

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加速地区内部的整合与一体化,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既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方式,也是转变外向型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在中国内陆地区的各个经济圈中,我们认为,川渝两省最有条件成为新的全国性第四个增长极和城市群。^①川渝地区以重庆和成都为双核,是西部地区人口与城镇数量最为密集、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和国防工业基地。自1997年川渝分省分治之后,四川和重庆两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东部沿海的三大经济圈相比,川渝地区人口最多,土地面积最大,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是长江等重要河流的重要生态屏障;与其他新兴的经济圈相比,川渝地区的经济总量最大,地理位置最为重要,文化、风俗、观念最为接近,条件最为成熟。当前,四川在加快地震灾后重建,利用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投资,建设更加美好的家园;重庆正加快落实胡锦涛总书记的“314”重要部署^②和《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

①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同志在2008年全国发展改革系统地区经济工作会议暨区域合作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近年来发改委的工作重点主要聚集在四类特殊区域。第一类是现在和未来的经济增长点,比如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京津冀都市圈、江苏沿海地区、辽宁沿海地区等;第二类是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如广西北部湾、吉林图们江地区等;第三类是特殊困难地区,比如新疆、宁夏、青海等省藏区等;第四类是国务院确定负有先行先试任务的改革试验区,如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成渝城乡统筹配套改革试验区、长株潭城市群和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

② 2007年,在重庆直辖10年站在新起点上的重要时刻,胡锦涛总书记对重庆作出了加快建设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三大定位”,明确了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大目标”,并就解决“三农”问题、老工业基地问题、民生问题、城市建设管理问题提出了“四大任务”,构成了中央对重庆的“314”总体部署。

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趁势而上，化危机为契机，保持高增长的势头。加速川渝经济一体化、构建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的天时、地利、人和皆已具备。

本文将要讨论和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在中西部地区构建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为什么说四川和重庆最有条件成为第四极？川渝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理论是什么？有哪些指标或特征？其指导思想和发展定位是什么？各有哪些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从促进区域一体化和协调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央应出台什么样的政策？川渝两地政府各自还应做出什么努力？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理论

什么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什么需要经济一体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丁伯根(Jan Tinbergen)于1950年首次提出经济一体化(Economic Integration)这一概念，他认为经济一体化就是将有关阻碍经济最有效运行的人为因素加以消除，通过相互协调和统一，创造最适宜的国际经济结构。实际上，这一概念同样可以被用来分析一国内部经济一体化的情况。

经济一体化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过程，它并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实现的。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发展的融合剂和加速器。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需要更大的发展空间，特别像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十分辽阔、人口极其众多、各地差异性甚大的国家，三十几个省级地区，消除它们之间的人为障碍因素，促进内部经济一体化，从而形成巨大的内需市场尤为重要。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在其名著《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中提出，经济一体化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个状态。

我们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商品、服务、生产要素、人才与信息的跨地区流动的规模与形式不断增加，通过地区之间分工和协作，在全国乃至世界市场范围内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从而使利益攸关方之间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的动态过程。在此过程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往往为了维护共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建立协调机制，通过制定规划或缔结条

约实施共同政策与措施互惠互利,从而达到共同利益最大化。^①

对于中国内部的省级行政区来说,区域经济一体化有三个维度:其一是内部一体化,如城乡经济一体化主要反映在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趋同,公共服务一体化主要反映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其二是省级行政区之间的一体化,特别是与周边省区市的一体化,主要反映在省际间贸易强度(即省际产品流通量与两省产品总产值比重)不断提高、人流密度(即省际人员往来的客运量与两省客运量比重)不断增加;其三是与国际的一体化,主要反映该地区外贸依存度(进出口贸易额占 GDP 比重)不断上升。

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尤其是一个国家内部一体化和地区一体化,最新的经济理论给出了政策意义非常明确的研究结果。

——新增长理论:创新、技术、知识、思想的传播和扩散有利于地区的经济增长

新增长理论认为,在经济一体化内部如果仅有货物贸易和流通,而没有技术、知识、思想的传播和扩散,则这种一体化并不能促进其各成员的长期经济增长。只有允许一体化内部成员之间的技术、知识思想的自由传播和扩散,才能通过提高人力资本产出率促进每个成员的产业部门的增长。

——新贸易理论:地理位置邻近的地区之间经济联系最密切

贸易引力模型(Trade Gravity Model)的基本思想来源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万有引力定律指出,两物体间的相互引力与两物体的质量成正比,与两物体间距离成反比。贸易引力模型指出,两国或地区之间的双边贸易额与这两国或地区的经济总量成正比,与两者间的空间距离成反比。因此,一个国家和地区最容易和邻近的国家或地区产生贸易和投资。并通过分工和协作,产生外部规模效益。比如,2007 年中国与周边国家或

①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在其发表的报告《全球一体化及其增长中的不均衡》中指出,国际一体化程度的主要测量指标是国际贸易、外国直接投资(FDI)以及国际金融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GDP)所占的比重。这三个指标实际上代表了全球市场一体化、全球生产一体化以及全球金融一体化的程度。